

The Evolution of PLA Guidelines for Training

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方针的历史演进

□ 肖德伟

摘要：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方针的历史演进经历了革命战争、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临战准备和持续深化训练改革四个时期。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训练方针，依据战争进程和作战对手的变化制定，指导军事训练为战争服务。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阶段的军事训练方针，依据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建设的需要制定，指导军事训练走向规范。临战准备阶段的军事训练方针，依据全国临战状态下“要准备打仗”的战略制定，指导军事训练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持续深化训练改革时期，依据军事训练的基本规律和时代特色制定，指导军事训练科学发展。

关键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史 军事训练方针 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E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83-（2012）04-0030-06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建立以来，军事训练方针一直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和职能任务的变化，不断调整充实，各个时期都有与时代背景和作战训练特点相适应的训练方针。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训练指导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各级指战员绝大部分来自工农，参军后迫切需要掌握武装斗争本领。但由于红军长期处于强大敌军的包围和进攻中，战斗紧张而频繁，没有专门时间进行训练，也不可能等训练好了再去打仗，只能结合战争实践，以战代训、以训促战、边打边训、打一仗进一步。这一时期，红军虽没有明确提出军事训练方针，但却从来没有忽视军事训练。毛泽东曾要求红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红军各部队的战术训练，通常在战前以连或班、排为单位召开会议，充分发扬军事民主，讨论上级赋予的任务，分析完成任务的有利与不利条件，制定完成战斗任务的措施，做好战斗准备；战后各级部队进行讲评，评指挥、评动作、评作风，由军事主官报告战斗经过，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红军部队还利用一切作战间隙和休整期进行集中整训，提高技术战术水平。1928年11月，红4军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针对大批农民和敌军俘虏加入红军、缺乏对游击战术与军事技术的了解和掌握、影响部队战斗力等情况，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要加紧训练军事技术，提高红军战斗力。根据决议精神，红4军从11月中旬开始，在宁冈新城、古城地区集结，进行了1个多月的以游击战术和军事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冬季训练。

1929年9月，中共中央向红4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史称“中央九月来信”），其中对红4军的军事训练问题做出了明确指示，强调红军军事训练要特别注意掌握军事技术，决不应附和不习惯严格训练与不受组织约束的农民意识，只有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才能加强战斗力。11月28日，在红4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决定了红4军整顿与训练计划。12月3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4个纵队在连城县新泉集中，进行为期10天的“新泉整训”，举办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集训中，朱德亲自上课，言传身教，组

织战术技术训练,还主持制订红军的各种条例、条令,为提高战斗力创造了条件。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训练指导

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继承红军时期边战边训、边整边训,利用作战间隙整军训练提高技术和战术水平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对日军作战特点,加强夜间、防炮、防空、防毒、防机械化部队的训练指导,切实提高部队战斗力,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1937年7月14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及加强抗日教育问题》的命令,要求“军事训练着重雪(实)地战斗、夜间动作、袭击战斗、防空技术、长途行军和无后方作战等项”^①。中央军委的这一命令,既针对日军作战和战场环境特点,也体现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高级将领对抗战初期针对性训练的把握。7月15日,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通令各部队首长,调整原7~9月的军事训练计划,明确部队训练和干部培训的重点内容。部队着重进行班、排、连进攻战斗和遭遇战斗演习;夜间袭击战斗和夜间作业;土工作业(制式器具缺乏时可借农具替代);步机枪对空射击和伪装隐蔽;对战车的防御与战斗;对骑兵的战斗;防毒常识学习和特等射手训练等。干部培训着重进行各种战斗指挥训练。^②上述命令指导了抗战初期八路军的军事训练。

抗战期间,八路军迅速发展,由成立时的4.6万人,到1938年底的15.6万余人,再到1940年的50万余人。由于部队发展迅速,干部新、战士新,加之战斗频繁,许多部队难以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高度重视新战士训练问题。1938年12月22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新战士教育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要加强军事、政治教育,使新战士很快成为熟练战士。^③12月25日,八路军总部发出关于教育训练新战士的军事训令,要求在2个月内完成新战士的教育训练,在2个月后能参加作战。^④1940年

11月28日,八路军总部结合百团大战实际,颁布《关于冬季军事教育的指示》,分析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部队所暴露出的战术、技术上的严重问题,指出不足,要求在军事教育与训练中克服这些问题。^⑤1943年10月,毛泽东号召驻陕甘宁边区部队进行一次大的训练。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亲自动员,确定了“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都练,士兵的教育又应以技术为主”的训练方针。11月,延安留守兵团冬季训练大规模展开,至1944年3月初结束。冬季大练兵运动不但取得了显著成绩,而且在具体训法上创造了一些经验。如官兵互学互教的群众路线;学用一致,从实战要求出发;培养典型,奖励模范,开展竞赛;各项工作以练兵为中心,不论军、政、后各方面的工作,相互配合协调,保障练兵任务的胜利完成。这些鲜活的经验,为开展大练兵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并转化为抗日人民武装军事训练的重要原则。

三、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训练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积极争取和平民主,挫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同时加强部队全面建设,大力开展军政练兵,从各方面做好应对全面内战的准备。这一时期的军事训练,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有所变化,初期强调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后期强调练攻城攻坚、练阵地作战,使人民解放军越练越精、越战越强,最终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33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② 军事科学院《左权军事文选》编辑组编:《左权军事文选》,74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121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中),7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⑤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589~591页。

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强调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①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规定练兵内容,即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的决心与信心”。自1946年5月下旬起,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开展3个月的军事大练兵活动。通过训练,人民解放军不仅在军政素质上有了很大提高,而且进一步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为尔后迎击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做了必要准备。1946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在《关于练兵和训练干部的指示》中,要求经常练兵,训练干部,善于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事、政治训练。1947年11月6~12日,晋察冀野战军进行石家庄战役,全歼国民党军2.4万余人。这次战役是一个较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国民党占据的重要城市的先例,为全军提高城市攻坚战术提供了重要经验。18日,朱德在晋察冀野战军召开的总结战役经验座谈会上强调指出要注意学习阵地攻坚战术。晋察冀野战军认真贯彻这一指示精神,在认真总结石家庄战役经验的基础上,大力开展阵地攻坚战的战术技术训练,使部队攻坚能力在现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高。12月25~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不仅对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发展和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展开阶段的军事训练方针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人民解放军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客观条件逐步成熟。从1950年开始,人民解放军在作战、剿匪和参加新中国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不失时

机地展开了正规化训练的实践和探索。这一阶段的军事训练方针,主要是对学习掌握新技术、进行正规化训练和加强文化教育的指导。

1950年11月5日,第一次全军军事学校暨部队训练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讨论教育方针、教育计划、教育制度、教材、器材供应计划和学校编制等问题,明确军事训练的基本方针,即“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联合作战”。为了实施正规的训练,会议提出了“统一战略、战术、意志,统一教材、典范,统一训练机构、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和战斗力”的要求,还强调必须建立正规的训练制度,从初级军事院校到军事学院,从连队到军训部,都要建立制度。1951年11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一九五二年军队训练的指示》,决定全军除海、空军及雷达部队之有文化者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这一方针,是为了更有准备和更有步骤地执行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方针,要求全军开展一个以扫盲为重点的文化学习运动,用50%的训练时间进行文化教育,扫除干部、战士中的文盲,将其提高到初小毕业的程度,并将已具有初小毕业程度的干部、战士普遍提高到高小毕业的程度,将已具有高小毕业的干部提高到相当于初中一年级的水平。1952年6月,全军掀起学习文化热潮,共抽调14万名干部担任文化教员和其他文教工作,师以上单位先后建立文化速成学校262所,许多团级单位举办了文化实习学校或文化轮训队。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教育运动。^②到1953年5月,全军文盲半文盲已从1951年的67.4%下降到30.2%,初小毕业以上者由16.4%上升到42.1%。6月,中央军委发出军队训练由“以文化教育为主”转入“以军事训练为主”的指示后,部队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教育的时间按6:2:2的比例进行。部队的文化教育仍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200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②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292页。

列为正规训练的内容之一，由突击式的教育转入长期的经常教育。通过大规模文化教育，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文化程度普遍得到提高，为学习和掌握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组织实施正规化训练创造了条件。

1956年3月，中央军委明确了以积极防御作为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并对军事训练的目标和任务做出相应调整。1957年1月，中央军委提出新的训练方针，即：“在人民解放军原有基础和优良传统基础上逐步提高现代军事技术，学会在新式武器条件下及夜间和复杂气候条件下诸军兵种合同作战，以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①这一方针，为部队训练指明了发展方向，使全军的训练逐步适应现代军事技术发展的形势和现代战争的需要，并引发全军性的正规化训练热潮。

五、坚持“以我为主”建设阶段的军事训练方针

1958年中央军委发起反“教条主义”运动后，提出“以我为主”的军队建设方针。据此，中央军委于1959年底提出了四条训练方针：“全军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继续总结人民解放军的经验，编出自己的条令；研究原子、导弹等条件下的作战与训练；有自学能力的干部应选读一部分马恩列斯的军事理论，军以上干部还应批判地选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以上四条训练方针，是人民解放军对新中国成立后军事训练实践反思的结果。其核心是在军事训练中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强调要总结和发扬人民解放军几十年建军、作战、训练经验，考虑中国国情、民族特色和地理特点，揭示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发展规律，阐明学习外军训练经验与自己实际相结合的相互关系，是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训练经验的总结，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军事训练认识的深化。

1960年初，中央军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情况时提出：“各级军事院校的学习内容应实行少而精的原则，凡可以不在学校学习的，和可以用自修办法学习的，则不应列入学校的课程”。同

年5月的全军院校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少而精”的思想，“教学内容要精简，要压缩，把那些次要的东西坚决削减”。之后的军委扩大会议，再次提出：“现在提出两个原则：一要少而精，二要短而少”，“少而精的精，就是要求精华，要求精通。无论政治、军事、文化教育都要少而精，部队、机关、院校的教育也都要少而精。”^②从此，“少而精”训练原则正式确立，并在全军迅速推广。1961年5~6月，各军区、军兵种训练会议相继召开，讨论落实“少而精”方针问题。“少而精”方针与“四条方针”在同一时期提出，但相互之间并不矛盾。从当时人民解放军的训练情况来看，“四条方针”明确了全军训练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少而精”方针则是贯彻执行这一总任务的路线，要求在训练时间相对固定的情况下，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处理好质与量、专与博的关系。两者之间是方向与道路的关系，既互有联系、又相互区别。

在新的训练方针指导下，全军部队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研究总结人民军队作战、建设、训练的历史经验，编写条令教材；大抓基础训练，建立“天天练、经常练”制度，广泛开展培养“三手”（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活动；扎实开展战备训练和临战训练；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组织大比武竞赛，在全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练兵热潮。

六、临战准备阶段的军事训练方针

1965年，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打压了全军性群众大练兵运动，军事训练工作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到干扰破坏，全军军事训练组织机构大部被裁减或撤销，军事训练工作受到严重削弱。1969年3月，珍宝岛自卫还击战后，由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全军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344页。

^②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41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军事训练开始得到恢复。这一阶段的军事训练方针,主要对实战条件下训练、新战法研究、诸军兵种协同训练等进行指导。

1969年10月,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要准备打仗”成为部队训练的基本指导,相继开展野营拉练和以打坦克为主的“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训练。1975年,毛泽东提出“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并强调指出,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据此,中央军委对军队各项工作特别是军事训练进行整顿,要求全军把军事训练作为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来抓。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做出《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全军军事训练工作逐渐复苏。

20世纪70年代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重新调整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并以此为依据重新确定军事训练的基本方针,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依据,研究解决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立足现有装备,照顾发展,准备打常规战争,也准备打核战争,演练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战法;树立合同作战思想,切实打好基础,加强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训练;针对敌情,结合作战任务和战区特点,从实战需要出发,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为实现上述方针,改革军事训练,逐步摆脱50年代和60年代训练模式的影响,中央军委提出在军事训练指导上实行“三个转变”,即从重点抓兵的训练转到重点抓干部的训练;从重点抓步兵的训练转到重点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的训练;从重点抓单一兵种训练转到重点抓合同训练。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全军部队加强干部的军事理论学习,着力提高现代条件下合成指挥能力;重视在现代作战中“三打”特点的研究,针对预定作战对象,探讨现代条件下打人民战争的理论原则和战术思想;加强合同战役战术训练,检验部队战斗力,提高部队整体素质和战备水平。

1983年11月,中央军委又进一步提出,部队

训练改革以合同战役战术训练为中心,着力提高“五种作战能力”的重要指导思想,即协同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后勤保障能力和野战生存能力。遵照这一指导思想,各战区结合作战任务探讨新战法,把检验性演习作为合同战役战术训练的基本类型,列为年度演习的主要形式,以提高现代条件下部队的“五种作战能力”。合同战役战术训练的内容和规模,由过去较多地进行单一课题、单级演练,发展到多级、多军兵种、多课题的演练。演练内容既有进攻和防御,又有合围与反合围、空降与反空降、突击与反突击、登陆与抗登陆等课目。

七、转入和平时期建设阶段的军事训练方针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解放军建设指导思想进行战略转变,即由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这次转变,对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增强国防实力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军事训练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一阶段的军事训练方针,主要从反映军事训练基本规律、体现军事训练最本质要求出发指导军事训练,同时也是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特点。

1988年12月中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确定新时期必须以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全军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加强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全面建设。针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之后,部分部队忽视军事训练,出现“粗训”、“漏训”现象,会议强调全军要把军事训练作为部队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抓紧抓好。会后,为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总参谋部提出5点训练指导方针:一是针对现实威胁和潜在威胁的不同情况,把军事训练的着眼点放在提高部队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上,着重研究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为全面提高部队作战能力打好基础;二是着重抓好作战值班部队,特别是重点保障的作战值班部队和重要方向一线边防、守备部队的训练;三是着眼不同战略方向和

作战对象的特点,加强针对性、适应性训练,努力掌握以现有武器装备战胜敌人的指挥艺术和作战方法;四是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扎扎实实地提高部队训练质量;五是以干部训练为重点,努力提高部队的合同作战能力。1990年4月6日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第一次将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方针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该《条例》在第一章总则中明确“军事训练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军事战略方针为依据,贯彻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三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方针”。该《条例》的颁发,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从此走上依据训练法规实施训练的轨道。“三从”方针,以极其鲜明的确定性,强调要以提高部队战斗力为目标,以实战需要为标准,进行高难度、严格、近似实战的训练。“从难”,反映了军事专业的特点,概括了确定军事训练内容的最高原则;“从严”,反映了军人掌握军事这门专业的途径,概括了进行军事训练的最高方法准则;“从实战需要出发”,反映了军事训练的目的性和归宿点,集中概括了指导军事训练的最高原则。从此,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方针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对于统一全军训练标准,不断提高军事训练正规化、现代化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八、持续深化训练改革阶段的军事训练方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战略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战争形态加快演进步伐。20世纪末相继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初步显示了信息化战争的特征,将世界范围的新军事变革推向新的高潮。中央军委准确把握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和国家军事安全态势,确立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军事斗争准备开始全面向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聚焦。1993~1997年的5年间,全军军事训练着眼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需要,瞄准高技术强敌,对战法和训练内容、训练方法、训练保障等进行全面而有重点地改革;从1998年开始,又以总参

谋部组织召开的“辽阳集训”为起点,掀起以学习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为主题的练兵热潮。军委总部提出“科技大练兵,一切为打赢”的口号,积极探索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的方法路子 and 训练保障新措施,推动军事训练由传统练兵向科技练兵的历史性转变。同时,军事训练领域贯彻落实“依法治军”方略,大力加强军事训练法规建设,克服军事训练的随意性,提高训练质量效益,努力实现由经验型向法制型转变。这一时期,全军上下围绕科技兴训、科技练兵、依法治训的军事训练创新发展主题,持续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健全军事训练法规体系,对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方针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导向作用。

2002年9月7日,中央军委颁布施行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条例》。新条例着眼现代高技术对军事训练的影响,在继承、总结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前瞻的眼光,顺应时代发展,在坚持“三从”方针的基础上,将“科技兴训、依法治训”首次纳入军事训练方针,丰富和发展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指导。科技兴训、依法治训是中央军委“科技强军”战略和“依法治军”方针在军事训练领域的具体体现。多年来,人民解放军一直坚持走科技兴训、依法治训的发展道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军事训练的推动作用,探索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的方法与途径,积极构建具有人民解放军特色的军事训练法规体系,推动着军事训练又好又快发展。

作者:肖德伟,军事科学院作战理论和条令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田越英